

焦祖尧:执著的现实主义者

□郑伯农

焦祖尧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戏剧……样样都有出色的篇章。作为文学晋军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不但以骄人的创作实绩为三晋文学增添了新光彩,而且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不论是活跃基层文化活动、培养本省文学新人,还是在为文学事业建言献策等方面,他都认真地投入大量精力,做了大量工作。

作为学机械制造的江苏人,祖尧一走出校门,就被分配到煤都大同。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而写得最多,一辈子都使他魂牵梦绕的是,煤矿工人的生活。人们习惯于把许多山西作家称为“山药蛋派”,祖尧从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等老作家身上继承了许多优良传统,如深入生活、乡土风味、雅俗共赏,等等。但我以为,不必把他归入“山药蛋派”。他算什么派?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坚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明的文艺方向和道路,一辈子毫不动摇地身体力行之。从生活中吸取素材,发现问题,发现人物,真实地再现生活,把实际生活典型化,这是他一辈子的艺术追求。祖尧是一位鲜有摇摆性的作家。一辈子写煤矿生活,一辈子走现实主义道路。他的读者,他的影响面,当然不止于煤矿,也不止于工人,但他无疑是写煤矿生活的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家。如果说他属什么派,我以为他自成一体,是个执著的现实主义者。

18年前,我有幸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黄河落天走山西》座谈会。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惟一一次焦祖尧作品研讨会。那是一部笔墨细腻、气魄宏伟的长篇报告文学。把握生活的深入细致、人物刻画的鲜明生动、时代风云的大开大阖,都使我惊叹不已,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学识的广博。最近,细读《跋涉者》,再度使我感慨丛生。

不少评论家认为,《跋涉者》批判了经济建设中“左”的路线,作者自己也这么表白过。我以为《跋涉者》诚然批判了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莽冲莽撞的“左”的错误,但其意义决不限于展示了“路线斗争”。老作家王汶石在给焦祖尧的信中说,

《跋涉者》的主要贡献,是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杨昭远这样一个难得的典型”。我赞同王老的意见。我以为,《跋涉者》成功塑造了新中国干部队伍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邵一锋和吴冲是同一类型的干部,只不过前者更含蓄内敛、更工于心计;后者更嚣张放肆、更善于赤膊上阵。对于邵一锋这样的干部来讲,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地位、升迁,什么人民的利益、人民的事业,只是挂在嘴边,在心目中是没有任何位置的。这样的干部往往特别善于揣摩领导的意图、观察政治风向,千方百计讨上级欢心。中央有什么新的部署,他们肯定会做出大力贯彻的样子,但只会耍花拳绣腿,搞形式主义、甚至把正确的方针层层加码、推向极端,以至完全变了味。大跃进年代,邵一锋等人努力贯彻“左”的方针,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工人安危,一味追求高指标,以至造成严重的工伤事故。粉碎“四人帮”后,他积习难改,和吴冲等人不惜违反科学规章,拿工人的生命安全当赌注,继续搞他的“政绩工程”。这种人不是哪条政治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的只是无限膨胀的私欲。为了谋取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左”“右”风盛行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右”得出奇。这种人物不但存在于煤炭战线,也存在于各行各业;可能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可能出现在今天或明天。如今,违反群众意愿,违反科学常识,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政绩工程”这样的事情不是仍然在发生吗!作者写出了人物的所作所为,也写出了行为背后的灵魂隐秘。所写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很高的警示价值。

正如老作家王汶石指出的,杨昭远是一个能可贵的文艺画廊中的新型典型人物形象。这个人物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技术干部。20多岁的时候,血气方刚、少年气盛,由于坚持科学的生产规范,得罪了部门领导,竟引来弥天大祸,被戴上帽子、革出工

矿,放逐到遥远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他得以平反昭雪,重回20多年前工作过的矿山。他没有带回丝毫“复仇”情绪,只是希望把失掉的时光追回来,好好干一番事业。不料邵一锋等人积习难改,仍然推行一系列阻碍生产发展、违背人民利益的措施。不少经过磨难的干部,岁月让他们逐渐失掉年轻时候的锐气,变得世故甚至圆滑了。杨昭远没有这样。他更老练、更讲策略了,但坚持原则的精神一点也没有变。不要天真地以为,经过拨乱反正,像杨昭远这样勇于坚持真理的人就会处处一帆风顺。小说显示出,邵一锋这样的人日子过得比杨昭远要滋润得多。杨的面前充满着艰难险阻,甚至充满着陷阱,日子仍然过得如履薄冰。作者塑造了与杨昭远交相辉映的一个女性形象——丁雪君。她正直、善良,一直深深爱着杨昭远。昭远被打入另册后,她坚信男友是无辜的,不但没有和他“划清界限”,而且在对方不和她往来的情况下足足等了他20多年。昭远重返矿山后,她全力支持昭远,又怕他重新遭到暗算,不希望他再露锋芒。昭远深深爱着她,但仍然害怕连累心爱的人,迟迟没有与她恢复恋人关系。丁雪君这个人物很有个性,她不但自己给人印象深刻,对于从侧面衬托男主人公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小说以雪君为叙述主人公,通过她的所见所闻所思和她的回忆来展开故事。作者吸收了西方“意识流”的手法,频频地时空交错,但意识流完全融化在现实主义之中,作品自然而流畅。小说的结局不是“大胜利”,写到上级觉察到邵一锋、吴冲等人制造假典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写到丁雪君终于克服胆小软弱,和杨昭远一起旗帜鲜明地伸张正义,二人终于结合在一起,故事就结束了,给读者留下无穷的想象和回味。

好几年没见到祖尧了。一个月前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文集在山西出版,接着就收到了沉甸甸的九册文集。抚读新书,心潮难平。想起祖尧,我就想起文学的神圣和友情的纯真。祖尧长我一岁,年近八十。愿这位老大哥身笔长健,心情永远舒朗。

一枝一叶总关情

——读郑伯权《一叶楼诗文集》 □李春林 马 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文艺,本质上就是人民的文艺。“为人民写作”便是作家责无旁贷的天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要复兴,作家有担当。郑伯权《一叶楼诗文集》(红旗出版社2014年8月版)全部内容呈现的,就是一位自称“江右布衣”的自觉的诗人的责任和担当。《一叶楼诗文集》,共收集旧体诗词70余首和散文若干篇,以中华民族传统诗文风格为追求,书写时代,服务人民,传递的是会被历史称道的——心系国家和民族,为百姓呼号的那种信仰之美和理想之美。

76岁的诗人郑伯权一生未仕,也无党派,最高的无冕头衔就是文学杂志记者,其他就是诗人、作家,年轻时也做过编辑。因“文革”的冲击,初负文坛诗名的他,写作被终止。“文革”结束后,朋友们重又各奔前程,诗人又提起了笔。“劫后红羊势已安,千帆今又出重滩”,大气候带来的好形势,让诗人掩不住内心的喜悦;“中兴事业诚非易,忧患明转也难”,也未掩住诗人的“居安思危”,然而,他坚定地相信国家前程光明;“天意欲将膺大任,庙堂哪用惧寒?”他鼓励得到重任的朋友,勇往直前赴京为官做去,还有什么担心的呢?“使君试把宣言读,猎猎红旗路更宽。”请把《共产党宣言》再读一遍吧,便会一路顺风,一往无前,道路越走越宽;诗人后来大胆的提醒:“乡园寄语桑麻事,瓯窭无忘问喘牛。”你在北京做了,可不要忘了乡园桑麻事,可不要忘记了田头烈日下喘气的老牛啊!这些诗句充分展示了诗人的勇气和艺术风范。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五四”青年节时曾对青年说过,他在当知青时,曾用“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做自己的座右铭。这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名

句,陶弘景有异操,对自己的学问要求严格。他认为读了万卷书,如果有一桩事情不晓得,就深为羞耻。后来,他敢于修正《诗经》注解的错误,缘于他深入到蜂狂蝶飞的最底层,一枝一叶与底层互动,在实践中获得了真知。可见,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书中《秦淮故事诗》从另一角度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追忆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以李香君血洒桃花扇,道出“国已破,何为家”的亡国之痛。“残山剩水已无多”,“君在马前献表时,妾于床上叠征衣,秦淮河上烟花女,愧煞前朝老尚书。”不经意间诗人洞察到,社会底层的烟花女比上层老尚书更知亡国恨。

读罢《一叶楼诗文集》,内心有一种感动,那就是“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本书的信仰,也是理想,是本书的看点。“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深入浅出的诗句,是郑板桥的《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的句子,全诗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句似写竹子,含义却很深刻。郑伯权的《枝叶园记》显然是受了郑板桥诗的影响,这位以“难得糊涂”自侃的官员郑板桥,关乎百姓疾苦之事却一点也不糊涂。于是,作者在文中引用了他的诗句,采用了这诗的意境。

《枝叶园记》是作者参观鄱阳湖畔江西廉政文化示范点“枝叶园”而写的游记。内容清新,文笔古朴流畅,状景、描物、写人、叙事,历史与现实结合,感情与景情相融。文章夹叙夹议,随笔挥洒,寓教于游乐,变景物为人文,化平凡为神奇。游园内荷影池塘,柳竹清风,乡邻与当地官员,游憩除庭,同话桑麻,忧乐与共;有钟秀山川哺育,周边土地代代名人,廉洁奉公,鼎彝风骨,竹柳风尚,薪火相传。作者寄妙理于小园枝叶,引“一枝一叶总关情”,寄托心志,“听萧萧之声思民间疾苦,遂尽瘁于民事,竭公仆之所能”;写“方塘之中,田禾荷叶,擎雨之珠,晶莹玉润,彰濂溪之高洁。……园庭之中一枝一叶,可歌、可咏、可风。”文章最后道出主题:“民贵泰山。”廉政文化示范点“枝叶园”虽小,人文价值可大;《枝叶园记》文字虽短,廉政理想却颇为崇高。作者不以艰深文其浅陋,而以淡泊明其高远,令这廉政文化示范点小景,比当今层出不穷、徒有山水而略逊文墨、忽视人文的景点,多了一份人生见解和文化底蕴。文以园存,园以文存,“爱民者民亦爱之,亲民者民亦亲之——民贵泰山”,这富有哲理的妙句,堪比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实主义书写中的形而上建构

——读蔡伟璇中篇小说《开红花的凤凰木》 □贺 颖

多年来,一直下意识地将厦门唤为厦门岛,想来许是着迷于那一片荡远无际的水域。常会遥想,被诸水环抱,被大海之上的星空日夜注视,那一片土地必会是一番别具意味的景致,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因其与陆地的遥远相距,亦必然会深具一种文化及精神的自由与盈逸。读了蔡伟璇的中篇小说《开红花的凤凰木》,喜悦之余亦深感慰藉,为了这一切与自己曾有的遥想的奇妙吻合,亦为了小说所带给自己的认知上的更多惊喜。正如厦门岛面对的是一览无余的大海,作者的小说,同样于写实的叙述中,建构出一种一览无余的精神空间,它们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充满文学的外延性、精神的动态性,这样形而上的结构,于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而言,无疑是十分难得而弥足珍贵的。亦因此,令得这篇小说的层次与空间,显得格外宏阔、舒展。熟知的生活、当下的时代,人心与人性、精神与伦理、文化与文明,这些简洁中满怀杂芜,纯真里蕴涵深刻的红尘百态,众生图景,读来如斯悠意丰满,厚重清朗。

蔡伟璇的这篇作品,难得可贵地完稿于鲁院,这于她自己,及于每个曾经有过鲁院生活的作家而言,仿佛都有了一番异样深远的情缘。那些贵重而永不曾逝去的存在与时间,亦似因此有了更为不朽的理由,因为这字里行间,弥漫着一个作家对生活、对思考、对情义、对铭记最为刻骨的贯穿与抵达。同时亦暗涵着对母校的感恩与报答。一些美好被刻意或必然延伸,令人不由得生发出新的审美判断。更为可喜的是此篇已发表于2015年《北京文学》第三期,更让自己的阅读感受着动人的欣喜与灼热。

小说中的人物我们其实都很熟悉,仿佛也同样生活在我们身边。小说以一个心怀梦想、几经命运跌宕的“文青”画家

西弗神话》中,他道出了真谛:“一切在荒谬的稀薄的空气中维持的生命,都需要某种深刻而又持久的思想,以使自己富于生气,否则,它们就无法继续下去。”

没错,这加缪口中“深刻而持久的、使自己富于生气的思想”之一,无疑就是每个作家赖以生存的文学。幸而有文学,此刻,当文学收留着我们险些被生活异化的肉身与灵魂,感念之余,我们亦会与潜藏于自己心魂深处的一切可能再次遭遇,我们的生命与魂魄,不要只要简单地“继续下去”,而是亦如那株如常盛放的“喷丹吐艳”凤凰木一样,完成一种从自我审视到自我灵修般的萌生与复活。

凤凰木,因其“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而得名,这样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作者以这样的一株“世上最色彩鲜艳的树木之一”开篇与收尾,陡然令作品有了非凡的精神指向,作者笔下真切,凡俗而纷扰的现实情境,有时反而成了这株凤凰木的远景。动态的流转的远景,真实而虚幻、无止而无息地演绎着,而这株盛开的凤凰木,以及满树的红花,那“飞凰之羽,丹凤之冠”,则成了全部的意义所在,成了人类灵魂恒远的向往与姿态。而在任何时代,与我们所曾经历经、正在历经以

在当代文学创作缺少经典的时候,路遥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以其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真生动表达,持续不断的社会影响和使人们产生深刻记忆而具有了分明的经典品格。《平凡的世界》一版再版,在人们直呼文学已经边缘化的环境背景下,竟然年年陆续印制发行了几百万册。这是《平凡的世界》的魅力使然,自然也是路遥文学创作辉煌的证明。令人非常惋惜的是,路遥却没有伴随自己小说的强烈影响走得更远。他英年早逝,不幸于1992年11月17日凌晨8时20分在西安逝世了,年仅43岁。路遥离世,将无尽的怜惜怀念之情留给了他的亲人、朋友和广大深情的读者。

路遥的人生是短暂的,但其同样短暂的文学创作经历的成果却是堪称辉煌。路遥的作品曾经获得过很多奖项,但任何一个奖项都不及长久地来自广大读者的浓厚阅读兴趣和深情的赞誉使他更加的欣慰。拥有常会使人们满足,失去自然也使人痛惜。路遥的文学作品和路遥自己的人生,恰恰就在使人满足和痛惜这两个点上让很多的人感怀不已!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同志曾邀我为设在铜川的“路遥纪念馆”题字,我很庄重地写下了如下内容:

好友路遥,曾经因创作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饥饿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而广为人们爱戴和喜欢,可惜他英年早逝,使人们惋惜遗憾非常。路遥为写《平凡的世界》,长期在陕西铜川煤矿体验生活,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作家,铜川煤矿决定建立路遥纪念馆,陕西作协的同志邀我书写参展,遂有如下:

在饥饿的日子里遭遇熬煎,惊心动魄的时候经历社会的波澜,开始于人生的思索与奋发,延伸到平凡世界的书写。苦难生活同命运改变的不断追寻,将文学的根扎进人生与土地的深处,具有永久的力量和存在的意义。路遥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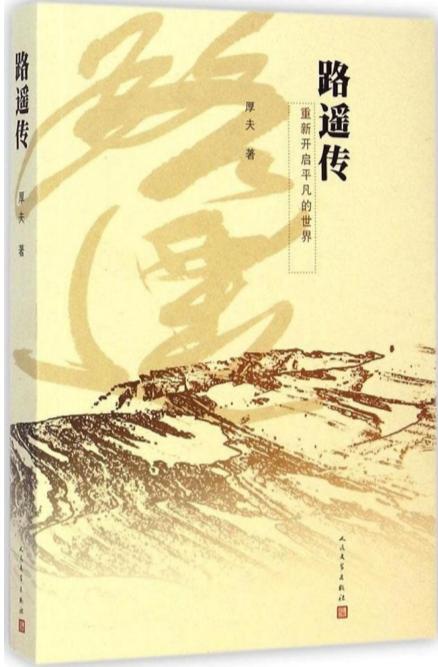
壬辰夏月为铜川路遥纪念馆撰并书 李炳银

“路遥不朽”,路遥曾经的人生和文学创作情形就有了认真追踪的必要。传记是对于那些在各自的人生事业上有了独特作为的人的一种追踪和真实记录,通常是一种褒奖和评判方式的表达。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公开的传记方式靠近,也不是所有有了传记靠近的人物都一定会有价值。但是,路遥是一个需要传记和担当得起传记表达的人。因此,路遥生前的文友、乡友厚夫以10年时间收集资料,深情投入所写出的《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就很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厚夫的《路遥传》,是在自己亲历和对许多知情者的访问记录后的路遥人生与文学创作情形的真实再现,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和内情解密特点。这是从传主人生和文学创作的源头流来的汨汨活水,对于读者走近和了解路遥的人生经历及精神世界、文学创作进程,非常有信息和认识理解的帮助,着实难得。此前,我也知道路遥一些人生苦难的情形,知道他在寻求改变命运过程中的些许艰难,知道他在感情婚姻生活方面的某些曲折,知道他在投身文学创作时的激情执著情景,在《平凡的世界》最初发表时我还给予过切实帮助,自以为是个了解理解路遥的人。可是,在阅读了厚夫这部《路遥传》之后,我感到自己对路遥的了解和理解还不够。厚夫同路遥有更亲近的接触和交往,对于路遥曾经的生存环境有直接感受,因此对路遥有真切的观察感受和理解。而路遥人生历程中的许多内容,是直接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表达的,如对于饥饿的感受表达,对于自身生活环境命运改变的奋斗等,都可以见出相互的内在关系。所以,《路遥传》不像有些传记作品,只是人物年谱式的追踪记录,带有机械生冷的缺点,而是在对传主真实人生的接近过程中,对于路遥人和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这样的传记作品,有内情消息,有情感温度,有感知理解,有生动形象的描述,对于传主经历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等,都有真实鲜活的交代。

厚夫的《路遥传》,让我们了解了路遥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所呈现出的个性与开拓。但是体现在路遥身上的那种不被动地服从命运安排,而在强悍的自尊性格伴随下奋起改变,谋求开拓的努力,却是一种很大的能量。这种能量是很多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所需要的。所以,它具有沟通很多读者的精神力量。《路遥传》既告诉人们不要屈服于命运,但更多地告诉人们路遥是如何地通过自身诚实坚韧的劳动付出和积极的开拓实现了自己命运的改变。因此,它对于如今很多处于抱怨和彷徨之中的人们,无疑会产生积极的启示和影响。路遥始终是个有所担当的人。小到对自己的父母家人和自己的人生前途,大到对广大处于弱势的人们以至国家民族的责任,他都表现出无私和凝重的负重意识。路遥不是只注重自己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期望通过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达到对社会有所培育和建设的人。路遥的抱负,如同陕北黄土高原一样的沉默和雄奇厚重,看起来冷峻苍茫,但其实是非常跳荡和激烈的。这些,都在厚夫的《路遥传》中真实生动地得到了验证。而这也,正是真正优秀的传记作品与那些平庸的简单地生平记录式传记、那些轻薄的阿谀献媚的传记的区别所在。

路遥的人生和他的文学作品,是一个解读空间巨大的话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感受和理解的对象。路遥不朽!



及将要历经的生活相比,灵魂的审美力量,才是生命诠释这世界的惟一可能,正如曼德尔斯塔姆说过的:“我生活着,然而我身在梦境”,必要强调的是,这是惟一可能,而不是补充或替代。或者是否可以说,是灵魂,令生命的存在与意义得以实现,令我们得以从平凡的生活与时间惯性中挣脱而出,从而完成一种不朽的书写。

凤凰,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同样承载着玄美神秘的意义,凤凰浴火而复活,从作者对小说主人公最后的安置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同样已经深谙此意的别具匠心,仿佛赋予读者的一个美妙灵犀。重生,希望,不朽,这是作者意图透过生活的现实磨砺,所要执意传递而出的光亮。这光亮,是重病的画家眼里的火焰,是作者引燃于每个读者心上的火焰:

“我抬头,赫然发现,邱红那仿佛总没有着眼前世的凄然漠然的眼眸里,燃着两簇火焰,那很久以来笼罩周身的淡青的光,也逐渐化作袅袅青烟,消散无踪。我乌云沉沉的心,忽然撕开一道缝隙,透出一道金光:生命之火既能重新燃起,就不会熄灭!”

“在地中海岸边的山峰下,当夜色淹没了海湾那无瑕的曲线,你就会领悟,如果希腊人知道了绝望这件事,他们一定将通过美和神性来使之升华,不像我们的时代,绝望总离不开丑和无助。”——这是加缪的另一句箴言。此刻,没有比这样的锦句更能慰藉我们繁复的心魂。是的,亦不会熄灭,这重新燃起的生命之火,历经命运颠沛与砥砺,于绝望中生出的希望,必将带有神的恩眷与祝福,带有上苍的恩赐,并如那株开红花的凤凰木,如被大海环抱,被星空深情注视的厦门岛,恒久地沐浴于加缪的“美和神性”的光芒之下,成为“美和神性”恒久的在场者,烛映命运之途,抚慰世道人心。

厚夫《路遥传》阅评
□李炳银

在平凡的世界里惊心动魄
——厚夫《路遥传》阅评
□李炳银